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相遇与对话

会议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

■ 卓新平 主编

■ 宗教文化出版社

相遇与对话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卓新平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遇与对话/卓新平主编.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8

ISBN 7-80123-525-8

I. 相... II. 卓... III. 文化交流-中国、西方国家-明清时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G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7883 号

相遇与对话

卓新平 主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责任编辑: 戴晨京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490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80123-525-8/B·154

定 价: 40.00 元

前 言

卓新平

2001年在人类历史上乃意义深远之年，它不仅代表着21世纪的来临，而且也是人类新千纪的开端。

在这一年金秋送爽的十月，来自海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聚集北京，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从10月14日至17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召开，由北京语言文化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利氏学社、巴黎利氏学社、葡萄牙驻华使馆、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法国驻华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等单位协办。会议期间与会代表

亦参加了《葡汉辞典》首发式和《虽逝犹存》一书中文版首发式,参观了“利氏地图学传统:明清两幅世界地图展览”和相关的小型艺术展览等。在 21 世纪之初我们举行这一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有着极为独特的学术蕴涵和历史意义。它是超越时空的回顾与展望,并应成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氛围中重新相遇、深入对话、沟通且超越东西方的一个学术乃至精神象征。2001 年是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到北京 400 周年纪念,其来华传教的经验教训、其促使中西交流的尝试和努力,迄今仍有独特意义和广泛影响。实际上,中西对话一直在延续,中西交流也一直没停止。经过数百年的历史风雨之后,在“全球化”氛围中“与时俱进”的今日中国,这种对话正走向深入,并有望获得富有建设性、具有实质性的进展或突破。

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得到了海内外有关机构及学术团体的大力支持,亦获得各界朋友的深切关注和热情关心。为我们会议提供资助和帮助的单位包括美国旧金山大学(特别是其文理学院、亚太中心和中西文化史讲座 EDS - Stewart Chair)、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法国驻华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台北利氏学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亦有不少海内外朋友以个人身份对我们的会议表示了各种支持与帮助,包括北京语言文化中心主任让·安东(Ron Anton)、葡萄牙驻华使馆文化专员高云霄(João Barroso)和文化参赞林达(Ermelinda Galamba de Oliveira)、法国驻华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文化专员戴鹤白(Roger Darrobers)、东方葡萄牙学会主席林宝娜(Ana Paula Laborinho)、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学术顾问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生梅欧金(Eugenio Menegon)、西班牙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易玛(Inma Gonzalez Puy)、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参赞马里奥·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研究、调查暨刊物处处长李淑仪(Stella Lee Shuk Yee)、中国美术出版总社首席摄影师石松、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研究员文庸、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张西平和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余三乐等。我们向支持和帮助我们组织召开这一会议的有关机构及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我们的合作单位、即共同筹办这次会议的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及其奉献的智慧和付出的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博士担任中方主席，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魏若望（John Witek）博士担任外方主席，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所长吴小新博士担任研讨会秘书长。研讨会共有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名学者与会或听会。其中有 36 位学者宣读了论文，大家围绕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历史交流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其大会发言共分为 7 个议题，涉及明末清初中西贸易、外交、传教与文化交流，不同地域的文化交往和沟通，语言文学的比较与对照，宗教与科学的对话，艺术的构思—实践，中西关系之档案文献的搜集发掘，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等，另设有两个分组发言。讨论内容包括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科学、宗教、神学、外交关系、经济交往、古籍版本比较等方面。此次研讨会的学术目的，在于推动对中西文化历史交流方面原始材料的开发与研究，由此亦旨在促进对历史文物及古迹的保护、研究。当然，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历史而历史，也应该以史为镜、以史为鉴，通过回顾、反思历史上中西文化之间的相遇与对话，而为我们今天的文化相遇和思想对话提供借鉴及启迪意义。这样，我们的历史研究就能成为活生生的、开放性的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研究，就能通古博今，继往开来，走出历史的迷茫，达到现今之澄明。就此而言，我们在历史学意义上所展开的这一研讨又不仅仅是原始史料的发掘，而亦蕴涵着历史哲理的找寻。

明末清初出现的中西文化之相遇与对话，在中外关系史上留

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这一页既让人以“好古”之态去追随,亦使人因“疑古”之虑而却步。实际上,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对话,正是其文化主体之人的相遇与对话,是其特有甚至信守的精神理念的相遇与对话。这种对话的艰辛和不易常使其筚路褴褛的有识之士或有志之士“出师未捷身先亡”,留下千古的遗憾和惊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后的相遇与对话则值得珍视和应该小心。为此我们在中西文化的沟通和对话上,不仅要找寻其同一性和互补性,也必须清楚认识其个殊性和差异性,既应有求同存异的努力,亦需要和而不同的冷静。我们应以历史学家的执著和姿态,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梳理中,获得解决历史疑难的思路和睿智,从而使我们的历史学有新的收获,并可能促进我们的历史有新的突破。

在上述 36 篇发言中,涉及的题目包括“早期的耶稣会士与中国明末的疆界”,“澳门海上贸易与早期世界市场的形成”,“神父或贵族?葡萄牙关于 18 世纪遣华外交使节性质的官方讨论”,“黄嘉略与孟德斯鸠”,“李九功及其《慎思录》”,“16 至 18 世纪湖北天主教特点分析”,“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团体之萌芽”,“明清时期东南宗族社会与天主教的传播”,“清代玻璃制造业:位于蚕池口的耶稣会作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利玛窦佛教语言的天主教经文》初探”,“从葡萄牙史学看澳门自治”,“传教士与中国科学的时段关联和特征影响”,“西学东渐与清代浙东学派”,“耶稣会士纪理安的《北京文件》”,“从 1637 年 Nicolas Fiva 的中国来信看:人文主义或是反改革态度”,“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以诗纪事,以诗证史——从《闽中诸公赠诗》看明末耶稣会士在福建活动的历史”,“西方语言学传统在中国:对早期汉语语法和词汇描述的分析(1682-1898)”,“误读的艺术——论晚明耶稣会士所用的欧洲古典寓言”,“17、18 世纪西方传教士所编辑的几本汉语辞典”,“中法殿军张雍敬:《定历玉衡》初探”,“奉教天文学家与‘礼仪之争’(1700-1702)”,“笛卡儿式科学在康熙宫廷”,“通过科学宣传

上帝:康熙时期耶稣会士的策略(1662-1722)”,“是民间仙女,还是圣母玛利亚?早期传教士与观音形象的接触”,“早期北京天主教教堂壁画初探”,“透视学在清朝宫廷:中国画家,西洋技巧和‘视学’的科学”,“利玛窦所贡‘西琴’研究”,“俄国档案馆中保存的北京耶稣会士的作品”,“徐家汇藏书楼与明清天主教研究”,“一部介绍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的中文图书与文件的摘要目录”,“明末清初的澳门是中西文化交往的桥梁”,“18世纪中国文献西译探讨”,“从西方学者的辩论看中西文化的同一性、差异性和互补性”,“勾画中国的基督教史”,“双城记:耶稣会士在北京与上海的科学和教育”。这些论文乃海内外学者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最新成果,其中不少作者亦为这一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为了使他们的重要成果得以保存,并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信息参考和资料借鉴,我们从中选出了26篇论文汇编为中文版的会议论文集出版。其英文版会议论文集则将由吴小新博士负责在欧美编辑出版。这部中文版会议论文集的翻译组织工作得到了吴小新博士的大力支持。此外,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利玛窦之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亦为本论文集的出版提供了资助。对于这些友好支持和资助,谨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

目 录

前 言	卓新平(1)
“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欢迎辞	卓新平(1)
早期耶稣会与明末疆界:中国人寻求和解之道	卜正民(3)
神父或贵族? 葡萄牙关于 18 世纪遣华外交使节性质的官方讨论	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29)
论 18 世纪后期澳门海上贸易的地区分布与商品结构	张廷茂(43)
李九功与《慎思录》	许理和(Erik Zürcher)(72)
16 至 18 世纪湖北天主教的发展特点分析——基督教与区域文化的相遇与对话	康志杰(96)
明末清初时期北京基督教会的发展	魏若望(John. W. Witek)(121)
明清宗族社会与天主教的传播	

2 · 相遇与对话 ·

- 一项立足于东南城乡的考察…………… 张先清(151)
- 西学东渐与清代浙东学派…………… 徐海松(186)
- 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 汤开建(216)
- 在中国的西方语言学传统 …… 白 珊(Sandra Breitenbach)(259)
- 以诗记事 以史证诗
- 从《闽中诸公赠诗》看明末耶稣会士在
福建的传教活动…………… 林金水(275)
- 误读的艺术
- 论明末耶稣会士所译介的伊索式
证道故事…………… 李爽学(295)
- 十七、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撰的汉语
字典…………… 马西尼(Federico Masini)(334)
- 反西法:《定历玉衡》初探…………… 祝平一(348)
- 中国康熙时代的笛卡尔科学
…………… 桥本敬造(Keizo Hashimoto)(366)
- 奉教天文学家与“礼仪之争”(1700-1702)…………… 韩 琦(381)
- 为了谁的荣耀?——康熙统治时期(1662-1722)
- 耶稣会士的策略…………… 詹嘉玲(Catherine Jami)(400)
- 清朝宫廷中的“耶稣会士透视理论”
…………… 伊丽(Elisabetta Corsi)(418)
- 早期北京天主堂壁画初探…………… 莫小也(451)
- 俄罗斯收藏的北京耶稣会士
作品…………… 庞晓梅(Tatiana A. Pang)(472)
-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的中文书籍和资料:
新目录…………… 鲁利(Paul Rule)(486)

徐家汇藏书楼与明清天主教史研究	李天纲(510)
明末清初的澳门是中西交往的桥梁	刘 芳(534)
从西方学者的辩论者看中西文化的同一性、 差异性和互补性	沈定平(570)
双城记:耶稣会在北京与上海的科学与教育 工作	魏扬波(Jean - Paul Wiest)(596)
勾画中国的基督教史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614)
论文出版及资助单位简介	(641)

“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欢迎辞

卓新平

尊敬的与会代表和各界朋友们：

在金秋送爽的十月，来自海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聚集北京，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21 世纪之初我们举行这一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有着极为独特的学术蕴涵和历史意义。它将是超越时空的回顾与展望，并应成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氛围中重新相遇、深入对话，沟通且超越东西方的一个学术乃至精神象征。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得到了海内外有关机构及学术团体的大力支持，亦获得各界朋友们的深切关注和热情关心。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全体与会代表及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支持和帮助我们组织召开这一会议的有关机构及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我们的合作单位、即共同筹办这次会议的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及其奉献的智慧和付出的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外专家学者将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历史交流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其议题涉及明末清初中西贸易、外交、传教与文化交流,不同地域的文化交往和沟通,语言文学的比较与对照,宗教与科学的对话,艺术的构思—实践,中西关系之档案文献的搜集发掘,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等,其内容包括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科学、宗教、神学、外交关系、经济交往、古籍版本比较等方面。此次研讨会的学术目的,在于推动对中西文化历史交流方面原始材料的开发与研究,由此亦旨在促进对历史文物及古迹的保护、研究。当然,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只是为历史而历史,也应该以史为镜、以史为鉴,通过回顾、反思历史上中西文化之间的相遇与对话,而为我们今天的文化相遇和思想对话提供借鉴及启迪意义。这样,我们的历史研究就能成为活生生的、开放性的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研究,就能通古博今,继往开来,走出历史的迷茫,达到现今之澄明。就此而言,我们在历史学意义上所展开的这一研讨又不仅仅是原始史料的发掘,而亦蕴涵着历史哲理的找寻。

明末清初出现的中西文化之相遇与对话,在中外关系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这一页既让人以“好古”之态去追随,亦使人因“疑古”之虑而却步。实际上,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对话,正是其文化主体之人的相遇与对话,是其特有甚至信守的精神理念的相遇与对话。这种对话的艰辛和不易常使其筚路蓝缕的有识之士或有志之士“出师未捷身先亡”,留下千古的遗憾和惊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后的相遇与对话则值得珍视和应该小心。为此我们在中西文化的沟通和对话上,不仅要找寻其同一性和互补性,也必须清楚认识其个性和差异性,既应有求同存异的努力,亦需要和而不同的冷静。让我们以历史学家的执著和姿态,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梳理中,获得解决历史疑难的思路和睿智。从而使我们的历史学有新的收获,并可能促进我们的历史有新的突破。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并预祝我们的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早期耶稣会与明末疆界： 中国人寻求和解之道

卜正民(Timothy Brook)

在欧洲看来,早期耶稣会进入中国,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史上,在欧洲全球扩张史上,以及在近代中国初期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所有这些看法都使耶稣会在那段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这段历史可以称之为欧洲边疆开拓史。边疆是扩张型社会进入的次制度化边缘地区(*under-institutionalized peripheries*),是危险而动荡的地方,但同时也可以想象,是有希望为他们背离的中心产生政治经济利益的区域。早期耶稣会被视为那种扩张的最佳文化媒介,他们来到一处欧洲人随后会越来越多出现,其影响会持久保持的边疆地区,希望同中国人建立久远的桥梁。以欧洲人的观点来看,中国在近代世界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而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很难把早期耶稣会的到来看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们的出现被记载下来,尤其是在他们因提供了弹道学和天文学的新信息而变得有用的时候,基督教也确实 在一些地方作为少数人宗教而扎下根来。但这只是更漫长的中国历史记载中不起眼的一笔。如果今天的中国人知道他们的到来

并赋予意义,那么他们是通过逆追溯的过程来做到的,将最近几个世纪的混乱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微妙的源头。从明朝人的观点来看,早期耶稣会的存在属于边界史。与边疆地区不同,边界是用来限定主权的外部界限和正常社会交往的地方。人们可以穿越边界做生意,却不会热衷于将自己的社会延伸出边界。社会群体可以居住到边界另一边,但是他们却只把自己看成是那儿的过客,而不是那儿的主人(一种也许没有根据的自知之明,但对维持同认定为“家园”的社会群体的经济联系与习惯联系仍然是很有用的)。在这种背景下,耶稣会士被视为许多不太重要的洋人中又一批穿越中国边境的人,而不是那些意欲使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的人。考虑到他们人数少,在明末影响不大,这便是一个全然合情理的评价了。他们身处边缘地区且保持着边缘化。没人能猜到他们的名声会同后来的帝国主义历史有瓜葛。

在边疆开拓史和疆界史两种截然相反的对照组成的构架中,我希望重新查验自万历末年至崇祯早年统治期间中国人对于欧洲人的存在的接受。这种接受就是我想要把早期耶稣会放入的语境,从一个明代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早期耶稣会,而不是从我们或者他们自己的视角。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早期耶稣会的重要性,而是要在中国的历史而非耶稣会或欧洲的历史中重新追溯他们的形象。我用来重建这语境的资料来源,就是可以在《实录》和高级官员文献集中找到的官方奏章。这些是政治交流的文本:它们被用来公开讨论政策主张,迫使其作者们眼光超越当下的问题,对因一般欧洲人的到来和他们的要求所带来的普遍挑战作出广泛解释,而不仅仅是耶稣会士和他们特殊的身份及兴趣所在。从这些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并不把早期耶稣会视为孤立的自我,而是当成一个大环境中的成员。徐光启(1562—1633)等一些人认为这种背景对他们有利,更多人则不然,还有另一些人愿意对欧洲人通融但是未必拥护他们的存在。这三种姿态

——欢迎、仇视及谨慎的调和——争相决定明朝关于如何对待洋人的政策。欢迎的姿态一向很难。当一定的冲突爆发时,对洋人的仇视往往占据上风。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些中国人在明末所采取的和解姿态会证明最强烈的传统形态的中国人对西方的定位。

在这篇文章中我回顾了明末欧洲人成为激烈辩论主题的3个关键性时刻:1612-1613年在兵部内要求广东有新的反走私措施;1616年礼部对南京耶稣会传教团的镇压;还有1630-1632年间征兵澳门,与前一年去北京援助明朝抵抗满人的一小队葡萄牙炮手并肩作战,兵部礼部的一些官员都参与其中。这些事件并非互不相干。除了以下事实,即后来辩论中的上书提到了早先辩论中表达的观点以外,使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贯穿其中的对澳门的意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每次的事件中,如何考虑澳门问题在形成对欧洲人是否构成威胁的评估中举足轻重,以及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威胁又达到了何种程度。澳门是对洋人忧患的一个天然焦点,因为1557年以来葡萄牙人在那里事实上的殖民地的存在,在明朝要么吸收洋人要么抵触洋人的政策中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畸形产物。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在《亚洲极值》这部关于1644年在中国传教的史稿中,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忧患。在描述中国文化排外特点的上下文中,他写道:“要是他们同澳门有任何一点接触的话,这也同他们所感受到的恰好相反,而他们的内心从未平静。无论动机如何,这些官员们很快展示了他们受伤的情感,为此上书皇帝,公开谴责这种耻辱并表现出自己对公众利益的极大热忱。”^①本文中我所用的奏折证实了古维亚的总体看法,认为澳门正是人人一致控诉的疆界妥协政策的一个令人恼火的罪证。然而,我也将说明,令人不快地提及澳门可以被用来制造有利于允许洋人存

^① 何大化:《亚洲极值(Asia extrema)》,第284页。感谢利亚姆·布罗基(Liam Brockey)的引言与翻译。

在的微妙论据。

为了把这三次辩战置于一个 16 世纪以来欧洲人在中国越来越多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我将从叙述熊明遇(1579-1649)的经历开始。熊明遇是北京耶稣会士的朋友,1630 年曾任兵部尚书时作为拥护雇佣外国炮手政策的大臣直接参与了第三次辩论。在他 1631 年 9 月的一次关于重新开放福建沿海和规范对葡贸易的上书中,他提供了一部很有用的欧洲人在华史,尽管很有意思地存在着偏见。^①他那简短的历史锁定在了倭寇,或者说“日本海盗”^②这个概念上。当欧洲人和葡萄牙人交替为中国作家们所知时,这类观念支配了明朝的注意力和对沿海问题的分析,包括关于“法兰吉人”的问题,或者说“法兰克人”。葡萄牙人不论在哪里不管怎样行动或是被观察,都被认为和日本海盗行径相一致。这种定位已经促使中国人把所有葡日间的联系看成是同谋的证据。

纵观全文,熊明遇努力展现了一部明代沿海政策史,比一部关于排外和排外回归的历史更为充实。他的记载不得不从洪武皇帝禁止日本进贡开始,但是指出此禁令并未阻断所有联系,例如允许通过浙江,福建,广州这三省海税局继续贸易往来。随后,他又注意到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走私数量增多,造成严重的腐败及弊端,尽管他拒绝提及嘉靖政府曾在 1525 年夏停止所有海上贸易,其时下达了命令捕捉和摧毁所有两桅或两桅以上的沿海船只。考虑到在排外者诉说的沿海历史中这显然合乎情理,所以这种情况微不足道。它对葡萄牙人的影响是要把葡萄牙人赶到秘密港口从

① “兵部尚书熊明遇等为敬称闽省开海禁及海外佛狼机等国通洋事题稿,”《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此后的《澳门问题》),杨继波等编,卷 1,第 15-16 页。熊明遇尽管主要兴趣似乎在于欧洲人的学识而非基督徒的信仰,他还是联合北京的耶稣会士,并为他们的两部书写了序言。他的传记和文献在张永堂的《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的第 5-48 页和冯锦荣的“明末熊明遇《格致草》内容探哲。”

② 16 世纪的倭寇问题在 Kwan-wai So 的《16 世纪明代中国的倭寇》中。